

语言与语言生态研究

邵 宜 主编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cology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语言与语言生态研究

邵 宜 主编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cology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语言生态研究/邵宜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668 - 1928 - 4

I. ①语… II. ①邵…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1942 号

语言与语言生态研究

YUYAN YU YUYAN SHENGTAI YANJIU

主 编: 邵 宜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黄圣英 郑晓玲

责任编辑: 郑晓玲 吴筱颖

责任校对: 周海燕 黄志波

责任印制: 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1.375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得到暨南大学“宁静致远工程”项目（暨南领航计划）“环南海周边国家语言资源库建设及语言生态研究”（15JNLH004）资助

前 言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的艾纳·豪根(Einar Haugen)于1972年提出,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研究从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以来,主要关注于语言结构的本体研究方面,之后有不少语言学家开始采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语言。21世纪以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大量使用,语言学家开始建立不同的语言数据库,对语言进行计量研究。同时出现了建立语言资源数据库和语言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但主要目的还是进行语言结构的本体研究,如汉语方言数据库和民族语言数据库,而将语言数据和自然资源数据结合的研究还比较少,使得语言的研究受到限制。比如,对于中国濒危语言的消亡,只从语言本身来看,基本找不到消亡的原因,也很难解释其消亡的过程和速度,更不用说提出相应的保护和保存方案。

近年来,有学者从历史、文化和经济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语言的接触、融合和演化过程。同时语言学家和生物基因工程学家也尝试开展了对语言与基因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正逐步从各个角度进入语言生态研究领域,推动了中国生态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语言生态研究能使我们认识到传统语言学的局限性,将多学科的理念和科学方法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中,这将推进对语言发展规律和语言演化本质的认识。同时,语言生态研究把地理信息和自然资源等信息与语言一起进行科学的研究,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境内和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化、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等，有利于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安全研究。

本书对语言生态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涉及的语言有印尼语、纳西语、彝语、朝鲜语、赫哲语、壮语等，力图从语言生态的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研究：①基于生态的语言接触、融合和演化研究；②语言社会使用情况的量化研究；③语言生态资源数据库研究及建设；④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认同研究；⑤地区性语言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经贸活动和地区安全的语言保障研究。目前，我们的语言生态研究工作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研究并未深入展开，书中可能存在纰漏，敬请指正。

邵 宣

2016年8月6日

目 录

前 言 /1

语言生态视阈下语言接触的观念与方法刍议 杜兆金 /1

新加坡 25 ~ 35 岁华族人士华语使用情况调查和分析 徐娇娇 /14

印尼邦加语言生态状况 叶携香 王茂林 /34

印度尼西亚语的系词小句和无动小句调查与描写 黄育妙 /39

印尼语和汉语名词特点的比较 李天娇 /59

海外华语词汇语法多样性考察及其相关问题

——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李计伟 /69

原始纳西语的人称代词与指示词系统 李子鹤 /81

纳西语否定表达的地域差异 杨亦花 /89

彝语方言唇音齿龈化现象的类型学研究 王丽梅 /95

湖南泸溪乡话濒危现状调查分析 邓 捷 /110

青海撒拉族和土族语言使用调查研究述要 杨 静 /118

近 80 年来黑龙江省赫哲语的衰变过程及衰变原因探析 金莉娜 /124

朝鲜语辅音的 EPG 语音研究 李英浩 张京花 /136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下的云南省汉语南亚、东南亚语种国际化
教育现状研究 杨光远 何冬梅 刘娟娟 /145

壮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建设 杨 锋 陈嘉猷 孔江平 /154

中国内地简化字使用者和香港繁体字使用者感知汉字时的识别模式
差异研究 杨若晓 /160

语言活力计算的方法与实践 邵宜 /169

语言生态视阈下语言接触的观念与方法刍议*

杜兆金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语言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语言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也离不开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本文从语言生态理论的视角,基于语言接触三要素,即接触语言、社会文化环境和接触者,梳理和讨论语言接触的观念、研究方法的问题,认为语言接触研究分为三种:语言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和接触主体分析法。其中,前者属于语言学方法,后两者属于非语言学方法。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应综合使用语言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和接触主体分析法,三种研究方法不可或缺,互相不可替代。语言接触观念及研究方法的讨论,可使我们对语言接触的特点和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语言生态;语言接触;方法论;对比分析;普遍标记性

一、引论

语言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语言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也离不开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语言接触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可观察事实。一种语言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总是与其他语言相互影响,或多或少融合了其他语言的成分。Markey (1982: 170) 曾指出:“所有语言都是接触语言 (contact language)。”1953 年,Weinreich 出版 *Language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一书,正式提出“语言接触”术语。自此,语言接触现象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1979 年 6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语言接触和语言冲突大会上,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接触语言学”(Coulmas, 1997: 287),并将其作为社会语言

*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方汉语和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及其演变机制研究”(批准编号:16BYY038,主持人:杜兆金)。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后 30 多年间,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如 Goebel 等 (1996)、Nelde (1997)、Winford (2003、2007)、张兴权 (2012) 等,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接触语言学的学科起源、发展脉络、研究内容和方法。

如何分析和解释语言接触现象,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学者的研究已经涉及语言接触观念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探讨,如 Weinreich (1953)、Thomason (2001)、Goebel 等 (1996) 等。但总体上看,对于语言接触观念及研究方法问题,学界尚缺乏专门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语言接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体系的完善。

语言接触现象纷繁复杂。国内外学者由于对语言现象强调和关注的内容不同,对语言接触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表述。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语言接触尚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界定。尽管如此,对语言接触的某些问题,学者们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任何语言接触均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①发生接触的语言;②语言接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③接触的主体——人。以上三个因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语言接触就不会发生,可称之为语言接触三要素。

学者们对语言接触三要素重要性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关注接触中的语言,研究制约语言接触的过程、结果的结构动因,或研究接触引发的演变;有些学者侧重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有些学者侧重语言接触主体的考察。而正是由于对语言接触三要素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认识,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与此相适应,语言接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语言结构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接触主体分析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有些学者使用其中一种分析方法,有些学者则同时使用两种分析方法,并有所侧重。

二、语言结构分析法

接触语言的语言结构变化,是语言接触中人们相对易于观察到的重要事实之一。语言结构分析一直也是学者们研究语言接触现象的基本方法。Weinreich (1953)、Lado (1957)、Thomason (1988、2001)、陈保亚 (1996) 等学者,均对接触语言的结构分析给予了足够重视。从具体操作上来看,语言结构分析法又可包括如下几种:

(一) 结构对比分析

根据 Weinreich (1953) 的研究,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语言接触现象始于布拉格学派。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特征从一种语言传播到另一种语言,只不过是通常所说的语言(内部的)演变的延伸,正如在单一语言内部的扩散受制于语言结构一样,一种语言接纳另一种语言的特征也要受制于受语的结构(Weinreich,

1953: 111)。任何语言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与周边其他语言的接触之中,这样其他语言的语言成分就有可能扩散进来。

处于接触环境中的语言,如何鉴别共享特征是本源特征还是外来的影响特征,是学者们关注和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Thomason (2001: 93-94) 提出了五条鉴别发生“接触引发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的标准:①确认受语(receiving language),可称之为语言 B;②确认源语(source language),可称之为语言 A;③找到语言 A、B 共有的那些语言特征;④证明这些共享特征在语言 A 中自古就有,即证明它们不是创新成分(innovations);⑤这些特征是语言 B 中的创新成分,即证明在语言 A、B 发生接触之前,这些特征在语言 B 中不存在。如果以上五条能全部满足,那么就相对有效地证明发生了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同时也能断定语言 B 中存在的这些特征是源自语言 A 的影响成分。

Thomason (2001) 所讨论的鉴别发生“接触引发演变”的标准,实际上也为鉴别接触环境下语言中的本源成分和接触成分提供了有效的操作程序和手段。近几十年来,借鉴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东亚地区的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语源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样也无法绕开鉴别本源成分和接触成分的问题。正如戴庆厦、罗自群(2006)所指出:“鉴别语言影响成分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和前提。”这说明,语言接触中的语言结构分析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对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研究相关学科的纵深发展。

在语言接触研究领域,Weinreich (1953) 首次系统阐述了语言结构分析法。Weinreich 观察到语言结构差异对语言接触会产生重要影响,两种语言结构差异越大,学习越困难,发生语言干扰的情形就越多,相应也就会出现许多学习上的错误(Weinreich, 1953: 1)。正是基于此种认识,Weinreich 认为,详尽考察接触语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领域的异同,是语言接触研究的必要条件(Weinreich, 1953: 2)。

Weinreich 以 Romansh 语和 Schwyzertütsch 语为例,讨论了结构空格(empty cases)在语言接触中的作用。Romansh 语和 Schwyzertütsch 语的音位格局,如下图所示:

Romansh (Feldis)				Schwyzertütsch (Thusis)			
m	n			m	n		
b	d			B	D		
p	t			p	t		a
				p ^f			(k)
f	ts	tf		f	ts	tf	k ^h
v	s	f		v	s	f	h
	z	ʒ			z		
	l				l		
	r				r		
j		w		j			
i	u			i	y	u	
	o			e	ø	o	
e	a			æ	ɑ		
//Stress				//Stress			

Romansh 语和 Schwyztütsch 语的音位格局 (Weinreich, 1953: 15)

方框里的音位表示该语言有而另一种语言没有的音位,如 Romansh 语音位系统中的 ʒ、ʎ、ɟ、ç、ɲ 等,在 Schwyzertütsch 语中就没有,从而在 Schwyzertütsch 语音位格局中形成“空格”。按照 Weinreich (1953) 的理论,ʒ 相对较容易填补到 Schwyzertütsch 语中的相应空格,而其他几个音位 ʎ、ɟ、ç、ɲ 等相对较难填补到 Schwyzertütsch 语中的相应空格。换句话说,学习 Romansh 语的 Schwyzertütsch 母语者,在遇到 ʒ、ʎ、ɟ、ç、ɲ 等母语中没有的音位时都会面临困难,但这些音位在填补到 Schwyzertütsch 语相应空格时存在困难程度的差异。相应地, Schwyzertütsch 母语者在学习 Romansh 语的这些语音时,会存在困难程度的差别:学习 ʒ 的困难程度较小,学习 ʎ、ɟ、ç、ɲ 的困难程度较大。

Weinreich 从音系结构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和 λ 、 j 、 c 、 η 等相比, z 相对较容易填补 Schwyzertütsch 语中的相应空格, 是因为 z 所具有的特征已包含在了 Schwyzertütsch 语音位系统的其他音位中, 如 j 的“舌曲拱”(tongue curving), z 、 v 等的“摩擦”(friction), z 、 B 的“松”(laxness) 等; 而 Schwyzertütsch 语音位系统中没有腭音序列, 因此 Romansh 语中的腭音 λ 、 j 、 c 、 η 也就相对较难填补到 Schwyzertütsch 语的相应结构空格中去。

二语习得本质上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特殊情况。不少学者注意到二语习得的难度与母语、目标语之间的差异有关,因此预测学习者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区域(difficult area),并用以指导二语教学,这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重点。Lado (1957) 基于母语(native language)、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语言结构差异提出“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Stockwell et al., 1965; Lee, 1968; Eckman, 1977; Ellis, 1994、1985、1997等)。对比分析假说认为,人们易于掌握(目标语中)那些与母语相同的语音成分,而难以掌握(目标语中)那些与母语相异的语音成分。对比分析假说强调

了母语和目标语结构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母语干扰等方面,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 语言协合程度

Weinreich 所讨论的 Schwyzertütsch 语母语者学习 ʒ 和 ʌ 、 j 、 c 、 n 所遇到的困难程度的差别,实际上与“回归的阶”(陈保亚,1996)有关。就二语习得来说,回归是指二语习得者的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逐渐向学习目标语靠拢,直至变得与目标语相同(事实上很难完全相同),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层面语言成分的回归;而回归的阶是指不同语言成分的回归程度、速度可能不同,但有些语言成分总是按照时间先后依次回归。例如,有 a 、 b 、 c 三个成分, a 最先完成回归, b 稍晚完成回归,而 c 最晚回归,这样 a 、 b 、 c 之间就存在回归的阶,可记为“ $\text{a} > \text{b} > \text{c}$ ”(“ $>$ ”代表左边的语音成分先于右边的语音成分回归)。

语言接触中存在回归的阶,是一个可观察的事实,但需要通过不同村寨的田野调查材料来证明。Weinreich (1953)、Lado (1957) 等的研究对学习者在某些特定语音的困难程度差异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写和解释,但没有经过不同村寨田野调查的最终检验,仍然没有证明 h 和 x 之间,或 ʒ 和 ʌ 、 j 、 c 、 n 之间存在回归的阶。陈保亚(1996: 62)基于德宏地区不同村寨傣汉语言接触情况的详细田野调查材料,讨论了语言接触中回归和并合的“有阶性”,认为语言有阶接触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以下三种结构因素所决定的:①不同类型的回归声母在傣汉语矩阵中造成的协合度的差异;②不同类型的声母并合给汉语声母矩阵的协合度造成的差异;③回归声母在汉语中的组合指数的差异。

在语言接触中,语言成分的借贷是普遍的现象,并且借贷也是有阶的。借贷的阶的产生,同样与语言的结构有关。陈保亚(1996: 133-137)讨论了傣汉语言接触中借贷与音系繁化的关系,认为通过借贷,傣语的繁化呈现出三个层次:①出现填补音节空格的新音节;②出现填补音类空格的新音类(如 kh 、 tsh 、 tɕh 、 n 、 io 、 iu 、 ioŋ);③出现新的区别性特征(如卷舌特征)。每一个繁化层都和傣汉语者汉化程度有关,汉化程度越高,繁化程度也越深。并且,通过德宏地区不同村寨的田野调查,三个繁化层的次序不能颠倒,第三个繁化层不出现在第二个繁化层之前,或第二个繁化层不出现在第一个繁化层之前,所以语音的借贷是有阶的,形成阶的原因是傣语音系的聚合关系。

Thomason (2001: 76-77) 讨论了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的语言预测因子(linguistic predictors),其中包括“语言系统整合程度”(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in a linguistic system)。语言系统各组成成分的语言整合程度存在差别,例如,词汇在语言系统中的整合程度较低,在特征(如卷舌)系统中的整合程度相对较高。一般而言,语言整合程度高的语言成分,在语言接触中相对较稳定;反之,

语言整合程度相对较低的语言成分,则相对较容易发生变化。Thomason (2001: 76) 认为,深深内嵌于语言结构系统中的特征,发生借贷或迁移的可能性较小。

不少学者深入讨论了语言接触中的借贷等级,如 Matras (1998)、Thomason (2001)、Field (2002)、Haspelmath (2008) 等。Field (2002: 38) 提出如下借贷等级(越靠近左边则相对越容易借贷):

实词 > 功能词 > 黏着词缀 > 屈折词缀

观察发现,在 Field 的借贷等级中,语言成分的系统整合程度自左向右是逐渐增加的,即语言成分的系统整合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发生借贷。语言整合程度为我们分析和解释语言接触的有阶性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思路。

(三) 语言类型距离

语言结构的对比分析,既可以在语言系统的某一层面上进行,也可以从整体上对两个语言系统进行比较。迄今影响较大的计算语言(方言)间差异程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测量两种语言共有的常用词汇的比例(Swadesh, 1952),另一种是测量方言的互相可懂度(mutual intelligibility)(Voegelin et al., 1951)。

结构相似的接触语言发生接触,是否会促进借贷或母语干扰?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Meillet (1921: 87) 认为,语法借贷或许只会发生在相似的语法系统之间,尤其是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Weinreich (1953: 33) 就注意结构的高度一致有利于语素的借用。Vildomec (1971: 78) 认为,真正促进语言相互干扰的不是语言间的差异,而是其相似性。Thomason (2001) 把语言接触中源语和受语之间的类型距离(typological distance)作为接触引发演变的预测因子之一,并认为即使那些语言整合程度较高的特征,在类型学相似程度高的语言之间,也容易发生系统间的语言成分交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方言之间的借贷,方言间借贷甚至可发生在屈折形态层面(Thomason, 2001: 77)。

曾晓渝(2012)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发现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可分为以下两类: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谰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学者们充分认识到接触语言的类型距离对语言接触的制约作用,但如何把语言类型距离量化,使之成为分析、解释语言接触现象的可观察参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社会文化分析法

语言接触离不开接触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分析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因素来研究语言现象,也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早在19世纪末期,许多学者就开始讨论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问题,如Hemphill (1898)、Schuchardt (1884)等。Weinreich在强调语言结构分析重要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对影响语言接触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称之为非结构因素,并专辟一章(第四章)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Weinreich认为,只有考虑那些语言外的因素,才能充分完整解释各类语言接触现象(Weinreich, 1953: 3)。这说明Weinreich把语言因素和语言外因素看做分析和解释语言接触现象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对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造成决定性的影响。Mufwene (2001、2008)借鉴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从“竞争”“选择”的视角研究语言接触中语言的演化、克里奥尔语的产生、语言全球化及语言消失等现象。该学者在考察语言接触时重视语言外部生态条件、结合语言外因素研究接触中的语言演变的做法,具有重要价值。

Thomason (2001)的*Language Contact*一书是对语言接触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重量级著作,该书详细论述了语言接触产生条件、接触机制、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以及双语现象、语言区域(语言联盟)、语言混合、语言死亡、语言濒危等重要问题。在该书中,Thomason尤其重视以社会文化分析法来处理语言接触现象。语言接触中的一个可观察事实是,有些语言成分容易借贷,有些则不易发生借贷,即存在借贷等级(borrowing scales/borrowing hierarchy),例如,词汇往往先于结构发生借贷。Thomason观察到,在语言偶然或零星接触(casual contact)条件下,发生借贷的是一些非基本词汇,而随着接触强度(intensity of contact)的增加,发生借贷的特征的种类也会随之增加,直至最后语言结构的所有成分都可能发生借贷(Thomason, 2001: 69)。这种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Thomason倾向以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语言接触现象,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接触程度具有决定性制约作用。

陈保亚(1996: 152-153)基于德宏地区汉傣语言接触的研究,提出语言接触具有“无界”“有阶”的特点,认为支配语言接触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方面: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社会因素决定了接触的深度,结构因素决定了接触的阶,因此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是互补的,互相不能取代。

Thomason关于接触强度与借贷关系的讨论,实际上体现的是语言接触的无界性。只要两种语言之间接触强度足够大,任何语言成分都可能发生借贷。这既是对可观察事实的支持,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然而必须承认,语言成分的

借用又是有阶的。语言接触的有阶性与语言结构有关。

四、接触主体分析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接触就是人的接触。接触主体因素同样会对语言接触造成决定性影响。有些接触现象,必须通过分析接触主体的情况才能得以解释。Thomason (2001: 66-76) 提出的接触引发演变的语言性预测因子,除了前文讨论的语言系统整合程度、语言类型距离外,还包括普遍标记性 (universal markedness)。这里我们不把普遍标记性作为语言结构因素,而是将之划归接触主体分析,因为语言普遍标记性本质上是与人学习语言难易程度有关的概念。

在语言学界,标记性概念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 Trubetzkoy (1939) 和 Jakobson (1941) 提出。根据布拉格学派等早期研究语言标记的学者的观点,最常见、自然、简单容易的语言成分或结构是无标记的,按照经济省力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无标记的语言成分或结构。Greenberg (1963)、Gundel 等 (1986)、Croft (1990、2003) 均强调分布标准,即在某一语言内部使用频率高或世界语言中分布广泛的项目是无标记的,否则是有标记的。例如,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 y,但很少语言没有 i。根据分布标准,i 是无标记的,y 是有标记的。

Lado 提出的对比分析假说在预测二语习得困难区域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无法解释学习难度的差别。通过对比英语、库尔德语 (Kurdish) 音系结构会发现,库尔德语有 h 、 x ,而英语没有这两个音。根据对比分析假说,英语母语者在学习库尔德语 h 、 x 时,会遇到相同的困难。事实上,美国学生学习 h 比学习 x 要困难得多。这说明,目标语中与母语相异的部分尽管都是学习的难点,但学习的困难程度存在差异。Brière (1968) 从 h 、 x 在世界语言的分布差异的角度,对美国学生学习 h 比学习 x 要困难进行了解释。从 h 、 x 在世界语言的分布来看,喉壁清擦音 h 的分布比舌根清擦音 x 的分布范围小。根据标记理论的分布标准, h 是有标记的 (或称标记性高), x 是无标记的 (或称标记性低),因此美国学生学习 h 时困难较大,而学习 x 时困难相对较小。标记性与二语语音习得的困难程度的关系问题,开始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

Heath 在讨论澳大利亚阿纳姆地 (Arnhem Land) 语言接触问题时,给出了一个语素音位特征扩散力的促进因子列表 (Heath, 1978: 105)。Heath 所列的促进因子都与“易于学习”有关:成音节 (syllabity)、边界清晰 (sharpness of boundaries)、功能单一 (unifunctionality)、范畴明确 (categorical clarity)。换句话说,易于学习的标记性低的语言成分,可促进语素音位特征的扩散;反之,难以学习的标记性高的语言成分,会阻碍语素音位特征的扩散。语素音位扩散力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语言接触的进程;语素音位扩散力弱,则对语言接触进程的

促进作用也相应较弱。可见,标记性的高低对语言接触的进程有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标记性程度低,会促进语言接触的进程;反之,标记性程度高,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语言接触的进程。尽管 Heath 在“易于学习”这样模糊的标记赋值标准上存在不足,但其把语言成分的标记程度高低与其扩散力强弱相联系的做法,对从标记性角度观察语言接触问题很有启发性。

在 Lado (1957) 和 Brière (1968) 的研究基础上, Eckman (1977) 提出“标记差异假说”(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其基本思想是:在母语和目标语相异的部分,有标记的(marked)语音成分难以习得,无标记的(unmarked)语音成分相对较容易习得。

对无声调语言的母语者来说,学习目标语中的声调是二语习得的难点之一。这是得到学界公认的一个可观察事实。结构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分析对此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这就需要从声调标记性来分析和观察。从世界语言分布来看,有声调的语言数量较少,无声调的语言数量较多。声调是有标记的,或称标记性程度高。Chiang (1979)、Broselow 等(1987)的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者在识别和使用汉语声调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而对于那些母语是声调语言,或者母语中无声调但已经拥有声调知识的学习者来说,学习目标语声调时难度相对较小。例如,约鲁巴语和泰语同为有声调语言, Gandour 等(1978)研究发现,约鲁巴人学习泰语的声调相对较容易,因为他们母语经验中的声调知识有助于学习者识别泰语中的超音段成分。

尽管标记差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比分析假说的理论缺陷,但标记差异假说对母语和目标语相同部分的习得困难程度无法做出预测。以 Altenberg 等(1983)报道的匈牙利语(Hungarian)母语者学习英语和 Eckman (1984)报道的波斯语(Farsi)母语者学习英语为例。据上述学者的调查,这些匈牙利语、波斯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将词末浊阻塞音清化。对比发现,英语、匈牙利语、波斯语词末位置都存在阻塞音的清浊对立。对比分析假说和标记差异假说处理的是母语和目标语的相异部分,因此也就无法对匈牙利语、波斯语母语者学习英语时“词末浊阻塞音清化”的错误做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词末浊阻塞音清化”错误也是由标记性造成的。从标记性看,词末阻塞音清浊对立是有标记的,词末阻塞音清浊没有对立(浊阻塞音清化)则是无标记的。学习者往往会选择无标记(或标记性程度低)的语言结构,而放弃有标记(或标记性程度高)的语言结构,尽管该结构在母语和目标语中都存在。

Eckman 提出的“结构同一性假说”(structural conformity hypothesis)克服了上述理论缺陷。该假说认为:适用于第一语言(primary languages)的语言共性的概括,也适用于中介语(interlanguages) (Eckman, 1991: 24)。根据结构同一